

民

俗

随

笔

丛

书

史迹俗辨

著 · 顾 颉 刚
编 · 钱 小 柏

圣贤文化
与
民众文化

祀典和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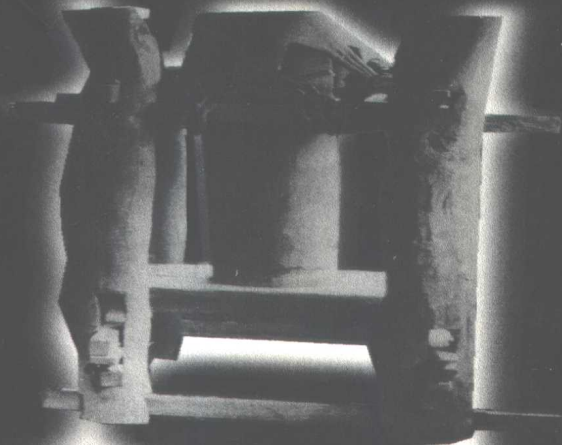
阴阳五行说

风雅颂之别

书经中的神话

上海文艺出版社

京)



史迹俗辨

民俗随笔从史迹
· 顾颉刚
· 钱小柏
著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涂 石

封面设计：周艳梅

民俗随笔丛书

史迹俗辨

顾颉刚 著

钱小柏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74,000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321-1654-9/K·102 定价：12.00元

出版说明

民俗耐人寻味,令人深思。伴随人类社会生活而存在的民俗事象,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富有民族、地域色彩的表现形式及其所涵盖的社会内容和人文意境,令人惊叹。本丛书收入现代作家、民间文艺学家、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撰写的民俗学术随笔,包括我国早期民俗学家和现今卓有成就的民俗学家的作品,是他们长期从事田野作业,研究传统生活方式及文化创造的理论结晶,是编辑出版民俗文化普及读物的一种尝试。风格多样,个性鲜明,多种人文学科交叉、民俗文化考察与人生哲理思考三者之结合,展示了丛书的视野与品位。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10月

代 前 言^①

我们这个刊物始出版时，没有一通发刊词。因为这是照例的东西，我们不愿意做这些无聊的形式。并且我们以为我们所有的一点平凡的见解已经融成了一般人的常识，再用不着说些肤泛的话来敷衍读者。

但近来颇受到几回教训，知道一般人对于我们的事业依然有许多误会。因此，我们胸中蓄着的一点平凡的见解似乎终有宣布的必要。现在就趁着本年始刊的机会说上几句话，做个引言。

去年十二月中，本校开二十七周年纪念会，本学门同时开放。参观的人先到考古学会陈列室，再到明清史料整理会陈列室，又到风俗学会和歌谣研究会的陈列室。这固然是路线的方便，但至少在程序上也可以说有一点意思，就是：使参观的人从古代看到现代，得到一点历史的观念；又从皇帝看到小民，得到一点学术平等的观念。我们在场中默察观者的意向，

① 本文原系作者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作始刊词，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二卷第十三期。借用为本书前言。

觉得他们到考古室时很感到鼎彝的名贵，到明清史料室时也很感到诏谕的尊严，但到了风俗和歌谣室时便不然了，很多人表示轻蔑的态度。有人看了纸牌和骨牌，怪诧道，“这种赌具放在这儿作什么用，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有人看了山西妇人的窄小的弓鞋，高声笑道，“这是所有的陈列的东西中最有趣的一件呀！”有人看了北京的玩具，鄙薄地说道，“这种小孩的玩意儿也配陈列到此地来吗！”我们觉得这虽是他们的不经意之谈，实在是最不了解我们的态度的地方，我们应当对于他们作一番诚挚的表白才是。

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一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所以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古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只要我们有研究的方法和兴致。固然，在风俗物品和歌谣中有许多是荒谬的，秽褻的，残忍的，但这些东西都从社会上搜集来，社会上有这些事实乃是我们所不能随心否认的。我们所要得到的是事实，我们自己愿意做的是研究；我们并不要把我们的机关改做社会教育的宣讲所，也不要把自己造成“劝人为善”的老道士。何况这些荒谬，秽褻，残忍的东西原不是现代的风俗和歌谣所专有。考古室里的甲骨卜辞和明器便

是荒谬思想的遗迹。史料室中更不少残忍的榜样，如凌迟处死，锉尸枭示等案卷。但这些荒谬和残忍的遗迹却是研究的最好的材料，因为它们能够清楚地表出历史的情状。假使我们一旦得到了汉代的“素女图”，当然不嫌它的秽褻，也要放到考古室里备研究。如果风俗室里有“磨镜党”的照片，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和素女图比较研究。我们研究这种东西的不犯淫罪，正如我们研究青洪帮的不犯强盗罪、研究谰纬的不犯造反罪一样。我们原不要把学问致用，也不要学问里寻出道德的标准来做自己立身的信条，我们为什么要对于事实作不忠实的遮掩呢！

从前的学者为了不注重事实，单注重书本，他们的学问在时代，阶级，应用等方面一切受限制，所以他们最容易上古人的当，以为古代是怎样好的一个黄金世界，如何叔季陵夷，至于今日。其实，他们对于现代固是茫然，就是对于古代也何尝明白。因为他们的学问的基础不筑在事实上，所以种种治国平天下的壮谈只成了书生的呆话。因为他们的态度不求真而单注重应用，所以造成了抑没理性的社会，二千余年来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现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归结。我们不信有可以做我们的准绳的书本，我们只信有可以从我们的努力研究而明白知道的事实。事实既诏示我们这般，我们便不能改说那般。可是这个诏示是要我们自己去寻出来的，我们并没有现成饭可吃。我们寻了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想在这个上面得到什么用处。固然，我们得到的结果也许可以致用，但这是我们的意外的收获而不是我们研究时的目的。

我们要秉着纯粹求真理的态度去观察事物，所以不容得

把个人的爱憎参入其间。我们个人尽可以(并且应该)厌恶赌博缠足到极端,尽可以(也应该)到社会上劝止这类行为;但在研究上,我们便惟恐得不到这种东西,惟恐得到的东西的不完备,惟恐得到了这种东西而我们不能完全懂得。这正如一个研究医学的人,他个人无论如何爱好洁净,甚至于一天洗三回澡,但在研究的必要时也只得到肮脏的脓血里,秽臭的便溺里,腐烂的尸体里去搜寻研究的材料。他在肉体上取了这些东西尚嫌不够,还要在自己家里潮湿黑暗的地方去培养病菌。这不是他的行为的冲突;正因为他研究学问,所以不得不如此。

上面说的是解释一种误会,还有许多别的误会也是应该解释的。

近来常有人说:“我们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因为国学是腐败的,它是葬送青年生命的陷阱。”这句话,我们承认是一句热诚的话,但我们不能承认是合理的。

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它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是无所不包的,上自星辰,下至河海,变幻如人心,污秽如尿溺,没有不可加以科学的研究。国学是什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学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倘使科学不是腐败的,国学也决不会腐败。倘使科学不是葬送青年生命的,国学也决不会葬送青年生命。为什么?因为研究科学必有一种研究的对象,而中国的历史材料也是一种可以做研究的对象的缘故。如果青年们仅要具备些常识,那么,无论什么科学都说不上研究。如果青年们要研究科

学,那么,他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为什么?因为高下的分别原是由应用上来的,材料的本身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只要你能在材料中找出真实的事实来,这便是科学上的成绩。若说国学是老学究的专业,青年们不当沾染老学究的气息,所以不当和它接近,那么,在青年人的科学中就不当有中国历史一科吗?一头猫,一块石,一根草,一座机械,是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为什么一个圭,一张皇榜,一个灶神,一首情歌,就出于科学家的研究的范围之外呢?若说科学家仅仅能研究自然,研究工艺,而不能研究社会,研究历史,那么,科学的领域未免太小了,科学的伎俩未免太低了,这人的眼光也未免太狭隘了。至于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贤遗言看做“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作研究的,当然说不到科学,我们也当然不能把国学一名轻易送给他们。若说他们在故纸堆中作生活,我们也在故纸堆中作生活,所以两方面终究是相近的,这无论我们的研究在故纸之外尚有实物的考查,就是我们完全投身于故纸堆中,也与他们截然异趣。为什么?因为野蛮人有拜火的,有拜蛇的,而物理学者也要研究火,生物学者也要研究蛇。当他们崇拜和研究的时候,他们的对象是一致的;但他们的目的与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若能知道研究火的物理学者不即是拜火教徒,研究蛇的动物学者也不即是拜蛇教徒,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研究国学的人不即是国粹论者了。

也许有人说,“我们固是要研究科学,但我们只要研究新的材料,不要研究旧的材料。”这句话在道理上虽讲不通,但在

混合应用与研究为一物的人的见解中生出这种误会原是很平常的，所以我们也得加以说明。

材料的新旧在应用上虽有区别，但在研究上是绝对不该有区别的。假使因为我们研究了三四千年来的历史就说是陈旧，那么研究数十万年来的人类演进状况的人类学要陈旧到怎么地步呢？研究数百万年来的地层沉积状况的地质学又要陈旧到怎么地步呢？研究数千万年来的星云星球构成状况的天文学又要陈旧到怎么地步呢？若看了天文地质诸学要欢喜赞叹，以为这些都是近世最进步的科学，而回转身来便一脚踢翻国学，以为这种旧家伙是不值得一盼的，这人也势利得太过分了！我们须知道，在应用上是应该有新的，因为人类的进化就靠在这新的努力上；但是我们要明白知道一事实，事实是不会没有由来的，由来之前更有由来，要去弄清楚它，就不能不在陈旧的东西里去寻找材料了。我们因为要做真实的研究，所以在我们的眼光里绝对不受应用上的新旧的界限的牵绊：上至石器时代石刀石斧之旧，下至今日时髦女子衣服饰物之新，一律收集，作平等的研究。

我们交往的人，也许有遗老，复辟党，国粹论者，帝国主义者。但这决不是我们的陈旧的表征。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只要这个人的学问和我们有关系，或者这个人虽没有学问而其生活的经历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系，我们为研究的便利计当然和他接近。我们所接近的原不是他的整个的人格而是他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一点。所以要是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发生了学问上的关系，我们也当然和他们接近。要是我们为研究某一项问题，一壁须邀三纲五常的儒教徒，一壁又须邀劳农专政的革命家时，我们也

当然会合他们于一堂。固然，他们或许因政治和道德主张的不同而不肯会面，或许会面之后因冲突而至于打架，但这是他们的不能尊重学问，在我们这个学术机关原是不希望他们如此的，而且也管不着这些事的。我们的目的只在勤勤恳恳地搜集材料而加以客观的研究，作真实的说明，在民国之下这样说，在帝国之下也是这样说，在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下还是这样说，事实是不会变的，我们所怕的只在材料的不完备，方法的不周密，得不到真实的事实；至于政治的变迁原是外界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说到这里，爱国的人不免出来拍桌子呵斥道，“好，你们竟说出政治的变迁是外界的事情，和你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了，你们胆敢如此的不爱国！现值国家多难之秋，正国民赴汤蹈火之时，你们还要玩物丧志、在无谓的考据上，说出这类的荒谬话。可见国学是弄不得的，弄了就要甘心做亡国奴了！”我们对于这般义烈的呵斥当然表示十分的敬意，但是还要表白我们的意见。

科学是纯粹客观性的，研究的人所期望的只在了解事物的真相，并不是要救世安民，所以是超国界的。学术若单标为救世，当然也可以媚世，甚至于惑世，如汉代的刘歆，张道陵，今世的刘师培，江希张（即张神童）之所为；但这原是说不上科学。国家多难之秋，国民固该尽救国的职责，但这句话原是对一班国民说的而不是对学术机关说的。学术机关只有一项任务，就是供给研究某种学问的人以研究上的种种便利，此外一切非所当问。学术机关中的个人是国民，他们迫于救国的热诚，为了国家而喊破了嗓子，而丢净了财产，而牺牲了生命，都是很可以的，但这与学术机关丝毫不发生关系。政治机关与

民众团体在国家多难之秋，竭力想法去救护国家，确是他们避免不了的责任，至于学术机关，它只要不被解散，就依然应该提倡学术，奖励研究。再论国民的本身，固然维护国家是共同的义务，但各人除了这一件事之外还有他们各个的不同的工作是不容否认的。各人才性的不同，也是没法勉强划一的。惟其有种种不同的工作，所以社会的构造会得非常复杂。惟其各人能发展自己的才性于工作之中，所以社会上各项事业会有发达的希望。世界上不能人人有学术的兴味，正与不能人人有政治的兴味相同。说各个国民应当有维护国家的义务，也正与说各个国民应当得到一点学术上的常识相同。我们说国民应当具备常识，并不责望他们殉学；那么，若说国民应当维护国家，也不过责望他们各尽国民一分子的义务，并不责望他们尽人殉国。殉学与殉国都是个人的兴趣，个人的信仰，而不是可以强迫他人去做的。所以一个国民，只要他能够具备些常识，而又懂得爱国，不阻挠爱国的行为，自己尽了国民一分子的应尽的义务，他就是一个最好的国民了。除了这些事情之外，他自应有他的专门的工作：或者种田，或者做工匠，或者开店铺，或者研究学问；只要他所度的生活适宜于他的才性，他能够勉力求出他的成绩，就得到了他的最正当的生活。一个国家所以站得住，所以能够发达，全在于国民的能尽了他们的国民的义务而又各有他们的专门的工作。我们如果承认学术机关是确以提倡学术为专责的，学术机关的个人是确以研究学术为他的专门的工作的，那么，他们就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依然埋头于学术上的问题原没有什么错处。现在若说，“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是弄些无关紧要的考据，你们真是不爱国极了，你们宜与卖国贼同罪！”那么，我们要回问道：你

们所谓爱国是怎样的？若说国家有事时狂喊乱跳了一阵，到兴致阑珊时就不管国事如何而销声匿迹，没有预备，没有方法，没有结果，像现在一般的所谓爱国团体之所为，这实在只算得一时的游戏的冲动，算不得爱国。若说我们应该编练民军去杀敌，结合暗杀团去对付国贼，组织讲演团到民间去宣传，设立调查研究的机关去商榷国事，那么，我们的机关里的个人随着他们的信仰与能力当然可以分头加入的，我们决没有阻挡的道理。但只要我们的机关不至被迫而毁灭时，只要全国的国民尚不至尽舍其工作而从事于救国时，只要还有几个人愿意到我们的机关里作研究时，我们仍当依照向日的计划而进行，毫不受时局的影响。就是外面炮声连天，铅子满地，我们的机关里依然可以做大家认为无用的考据的工作，为什么？考据的工作原是我们这个学术机关的生命，只要我们这个机关有一天的存在就该做一天的本分的工作。

说国学就是科学，已经要引起一般人的怀疑。说科学的目的不在应用，更当激起许多人的骇怪。他们一定要想：“外国的国富兵强不是全靠科学吗，中国的贫弱不振也不是全因没有科学吗，为什么要故意的这样说？”他们不知道机械、枪炮、火药原不是科学，乃是研究科学所得的结果的应用。造机械的是应用力学的研究的结果，造火药的是应用化学的研究的结果，但研究力学与化学的人却自有他们纯粹研究的学问，并不志在造出若干应用的东西。惟其他有许多专心研究的人研究着一般人看为无用的学理，能够处处发见真事实，因此有人要应用时也就有了事实的基础而容易成功。所以科学的应用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只因它的用是间接的，它的本身没有用，所以为一般急功近利的人所不喜，他们看不见它的真

价值，只觉得是些“无聊的考据”。但也因为它的本身没有用，不为现实的社会所拘束，所以它的范围可以愈放愈大，发见的真理也愈积愈多，要去寻应用的材料也日益便利。这就是无用之用。返看我们的学术社会是怎样。他们因为没有求真理的知识欲而单有实际应用的政治欲，所以只知道宣传救世的方法。董仲舒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这就是他们的一切思想的总纲。这在他们固然是一番好意，要请所有的人都去救人，要驱种种才性不同的人都去做同一的工作，但试问他们有了什么成绩？他们在古代，只知道实现个人的理想国，在后世，只知道实现古人的理想国，却是忘记了社会国家的实况，想不到做任何种实地调查及研究的事业。这还是他们中的优秀人物呢，这些人虽不知道事实，但究竟还有些理想；至于下劣的分子便连这一点也没有了，只知道保守几部古书，把几部古书看作整个的学问。这种的传统思想传了两千余年，自然科学固然发不出萌芽来，就是社会科学也何曾为了他们的应用的热忱而能够成立！至于今日，思想学问一切空虚，社会国家一例衰败，可以说都是受了这种徒知“以有用为用”的谬见的影响。现在我们既从时代潮流中认识科学的重要，但尚不能知道科学的基础是建筑于事实上而不是建筑于应用上的，依然要把应用看做一切的学问的标准，这种人的愚昧也着实可悲了！

自从欧战之后，很有些人咒诅科学，说科学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种话虽与上文所说的赞叹科学的不同，但它们的出发点是同一的：就是“应用”。他们不知道，科学的本身是没有好坏的，但用它的人则可好可坏。正如矿中一块铁，它的本

身只是一块铁，在自然界中说不到好坏，也说不到有用无用。一旦给矿工取了出来，再给冶工制成器具，它是有用了，但也说不上好坏。因为它若是一柄刀，固然可以用来杀坏人，但也可以用来杀好人。杀坏人时它不受“为民除暴”的赞美，杀好人时也不受“屈斩忠良”的骂詈，它若是制成了一柄枪，它为帝国主义者用以劫夺别人和为国家主义者用以抵御别人的劫夺都是可以的，但它是同样的不负责任。负责任的是谁？是用刀来杀人的帝国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禁止用刀杀人，排斥帝国主义者，是政治家和社会改造家的任务，而不是矿工冶工的任务，更不是铁的任务。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对于现社会感着种种的不满，我们要想改良它，只有我们自己起来做改革的事业，而不能责备到学术方面，痛斥科学的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学者的发明的助长了帝国主义的气焰，因为这是用的人的不对，谁叫好人没有力量去用它呢！

话说得如此远，只为辨明“求知”与“应用”是两条不同的大路，虽然有时候是可以关联的。我们要是由应用上着眼，那么学术原是很浅近的东西，正如一座衙门，只要有了几个会查案卷的书吏，就可以算行政；一个团体，只要有了几个会喊革命的青年，就可以算救国，但是环境变了，这一点浅近的伎俩不够用了，学术却还是只有这一点，就连应用的一方面也丧失了，例如秦汉以后的儒生抱了孔孟的遗书而想治国平天下。我们若改由求知上着眼，那么学术乃是极深邃的东西；天地间森罗的万象，我们真实知道的有多少，不是混茫大海中的一滴吗！我们真是随处可以感到自己知识的微小。我们为要补救这个缺憾，所以要造成了一个学术社会而去共同讨论；要把科目分而又分，一个人可以专攻一小部分；要使有志研究学问的

人可以随着自己的性之所近而择取某小部分。我们在研究时，心里所想到的只是这一小部分中的材料如何可以整理清楚，如何可以解释里面的种种原因，却绝对不想到把这些东西拿来应用。固然，我们研究的东西也许是社会上很需要的，也许现在虽没有用而将来可以大用的，但这样的斟酌取舍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尽力于研究还来不及，那能顾到这一方面呢。因为我们不想到有用，所以也不想到无用。一个问题，尽管社会上看作无谓的，丑恶的，永不生效用的，但我们既感到可以研究而自己又有兴致和方法去研究，那就不能迁就他人的意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了。

至于我们所希望于社会的，乃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的态度而不加以种种的阻碍，并不是说惟有我们的学问是学问，你们该来随从我们，做我们的徒党。这种道一风同的观念，在政治上不知怎么样，在学问上则决是个蠹贼。它的弊害，是使人只会崇拜几个偶像，而不会自去寻求，得到真实的见解。我们要研究国学，并不是为国学容易出锋头，容易依附名流，只为我们有研究历史的兴味，而中国的历史材料非常丰富，我们既有了许多材料，不忍不牺牲了毕生的精力去做研究的工作。我们只希望有了这一个结合，容易和外面的真实的同志声气相应，作许多的切磋，并不希望有若干正在求普通知识的青年弃了他们的应做的课业而来附和我们。固然，我们未尝不希望后起的青年中有性情近于研究科学的，环境适于研究国学的来做我们的同志，但这是只可作希望而不可作要求的。说到希望，我们的希望真多着咧。我们深知道别种科学不发达时，国学方面也要因为没有帮助而不得十分进展的，

所以我们酷望别种科学的兴起。我们希望多出许多地质学家,从他们的研究里得到许多上古史料,补正我们的考古学会的研究。我们希望多出许多语言学家,搜集了无数中国的方言和古语及外来语而加以研究,和我们的方言调查会提携并进。我们希望多出许多医学家和药学家,把中医中药详加分析考查,说明中国古代医学在科学的医学上的位置。我们希望多出许多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把《诗经》、《楚辞》、《山海经》、《本草》里的许多动植物名加以研究,说明中国古代动植物的形状和分布区域。这种的希望一时也说不尽,数不清。总之,我们这个机关并不是(也不能)要包办国学的,我们需求于别种科学的专门人才之处真是非常的多。反转来说,如果各种科学都发达,中国方面的各科的材料都有人去研究,那么,我们的范围就可缩小,我们就可纯粹研究狭义的历史,不必用这模糊不清的“国学”二字做我们的标名,就可以老实写做“中国历史学门”了。(要放大一点,可以称“东方历史”,或便单称“历史”,都无不可。)

更进一步说,现在各种科学都不发达,一来是因没有人提倡,二来是因材料与设备俱极寡少。国学方面的材料是极丰富的,就是手头没有,要去搜集也不甚困难,加以从前人的研究的范围又极窄隘,留下许多未发的富源,现在用了新的眼光去看,真不知道可以开辟出多少新天地来,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我们真高兴,由得我们在这个新天地中放出手腕做去。凡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土地,在初施种植的时候,很容易得到极好的收获。我们在这新天地中从事研究,得到的成绩的可观是不足奇的。若能因了我们的较美满的成绩引起研究他种学问的人的注意,知道无论那种学问,只要会做,